

特别关注

每年节日前后都是网络诈骗高发期。互联网安全厂商正在与犯罪分子展开殊死对抗——

筑起网络安全城墙

□ 本报记者 陈 静

“明天你到领导办公室来一下”“你购买的商品缺货需要退款”“您的工商银行积分即将过期”……不少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诈骗信息。你是否注意到，一些诈骗电话在你接听之前已被标记出来，部分诈骗短信则被直接拦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由腾讯安全牵头的全国首个反信息诈骗联盟“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最近宣布，2015年该联盟直接劝阻2.2万余人被骗汇款，涉及金额1.8亿余元，帮助2.14万名事主快速拦阻被骗资金3.54亿余元，避免和挽回群众的损失5.34亿元。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网络诈骗高发期，日前，记者走进腾讯安全，听专家们讲述网络诈骗形势的变化，以及在小小的手机屏幕背后，互联网安全厂商与犯罪分子展开的一场“看不见的硝烟”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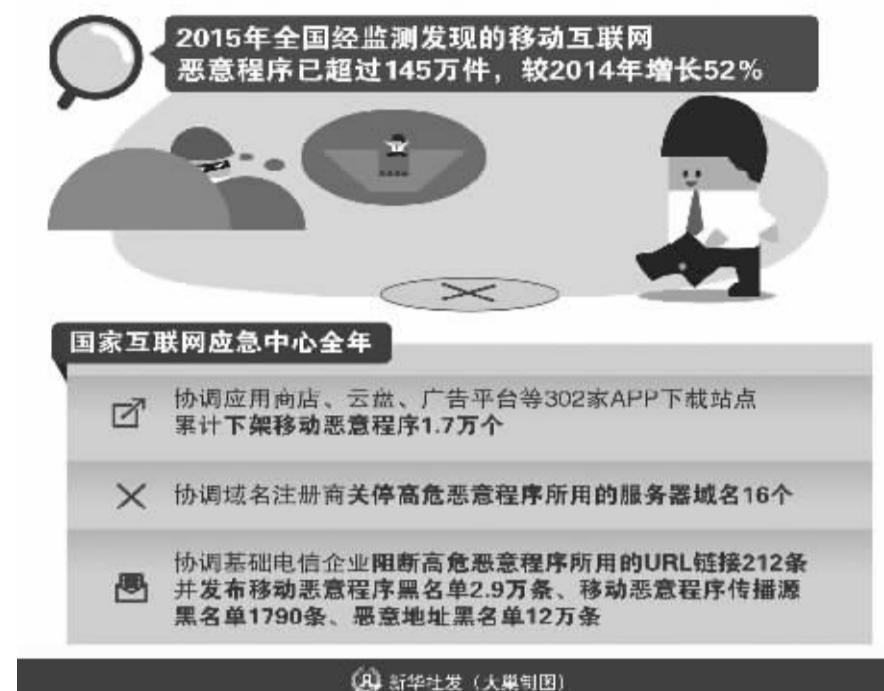
“精准大额”成为新趋势

腾讯安全云高级总监邵付东在腾讯安全团队工作已有6年。“安全公司在PC时代主要是修漏洞，防止恶意插件和灰色插件，再后来就是防治游戏盗号木马，验证用户下载的各种程序，‘杀’掉其中的木马，逐渐发展出诸如云引擎这样的特有的安全技术，犯罪分子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骗钱的路子基本堵死了，他们只有另寻新的路径。”

这个新的路径就是移动互联网。邵付东对2014年夏天爆发的一场被称为“XX神器”的手机蠕虫病毒记忆犹新。“这款手机蠕虫病毒其实是给用户通讯录中的每个电话号码发送一条短信，‘(手机联系人姓名)看这个+****/XXshenqi.apk’，在PC时代，一天能有几百万下载一个木马已经不得了了，但这个蠕虫的蔓延完全是指级别的。这充分体现出移动互联网网络诈骗的新变化，利用掌握的用户个人信息来获取信任。”

安全对抗由此从“广撒网”变成了“点对点”的精准对抗。“和互联网安全厂商一样，诈骗团伙也开始掌握用户的‘大数据’，并由此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有人专门盗取数据，比如拖库攻击，有人专门清洗数据，还有编剧根据社会工程学来写一个剧本，然后再有人按照剧本实施。”邵付东告诉记者，“这样精细化的分工，一是让链条更长，更难打击，二是对用户的诈骗趋向于情景化，比如你在网上刚买了东西，骗子马上冒充店主打来电话，告诉你这款商品现在缺货，随即给你一个链接让你点击退款，你一点击就会中了木马。精准诈骗让网络诈骗从针对群体的微利模式走向针对个体的暴利模式”。的确，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深圳地区涉及案件中，单一案件损失金额最高已达1600万元，而动辄损失百万元以上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

2015年我国新增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同比增长52%



腾讯安全云部副总经理李旭阳告诉记者，移动互联网兴起带来的诈骗手段的变化，也让受害者的身份出现了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说‘智商低才被骗’，但现在，‘高知人群’成了大额诈骗的重灾区，腾讯通过数据分析发现，40岁以上中老年人最容易上当受骗，占受骗总人数的62%，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往往受了骗还不愿声张。”

环环相扣合力打击

“蔓延速度快，防范难度高，金额损失大。这些新的形势变化，让安全对抗方式也必须随之升级，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团结各方，除掉成见、开放能力，用协同方式共同对用户进行保护。”邵付东表示。

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由此应运而生。腾讯副总裁丁珂介绍，这个成立于2013年底的网络安全联盟首创“警企民”协作体系。“通过建立信息诈骗数据库并开放共享，建立警方、银行、运营商和腾讯等网络公司的快速协同机制，针对信息诈骗形成事前教育、事中受理、事后打击的闭环。”拿查询和举报渠道来说，网民们可以通过天下无贼微信公号、首都网警微信公号、天下无贼官网、腾讯手机管家来查询和举报信息诈骗。

“这其实相当于在网民可能遭遇损失

的各个节点竖起一道道高墙。”深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检查分局副局长薛克勋告诉记者，去年天下无贼反诈骗联盟曾经协助广州警方破获10086短信特大电信诈骗案，成功抓捕了整个诈骗黑色产业链上27名嫌疑人，并缴获大批嫌疑人用于作案涉案物资。在另一大案中，联盟协助深圳警方瞬时开启资金诈骗止付机制，接到报案后仅用不到15分钟便拦下某公司被骗赃款共计1456万元。

在腾讯副总裁马斌看来，联盟未来还要继续扩容，形成2.0版的反诈骗防御体系，即在线下警企民反诈骗闭环的基础上，反诈骗阵营向线上扩容，建立线上反诈骗预警、诈骗资金拦截及诈骗黑名单机制，在用户消费及转账等场景进行布防；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和监督机制，并对造成用户消费信息泄露等服务机构进行公示和督促整改。

目前，腾讯正探讨在内容上拓宽与相关机构合作的范围。邵付东刚刚“搞定”了和招商银行打击伪基站的合作。简单说，诈骗分子刚刚背着背包发出一条伪基站的短信，我们马上就从用户那里能够收集到短信中附带的恶意网址，在几十秒时间里完成检测，然后实时把这个数据提供给招行，招行一边进行防范，一边通过公安来协助关停，同时通知其他安全软件进行拦截。而在用户端，对发生的这一切几

乎是无感知的，用户只会发现收到一条短信，但附加网址却打不开。”

从“大数据”到“深数据”

仅有联盟是远远不够的。在邵付东看来，联盟是扩大安全打击的火力范围，而大数据的技术创新才是为精准打击提供的“核武器”。“我们投入了500多台服务器，包括微信、QQ、浏览器、搜索引擎，所有这些产品线上收到的网址，都要先来这里和恶意网址比对一次，每天有300亿次的请求进来，对恶意网址进行7000万到8000万次的拦截。通过长期积累，我们已掌握大量数据。”

利用大数据分析，邵付东的安全团队几乎对“骗子”了如指掌：“我们不但能够定位这些人，还能分析他的传播行为和宿主行为，描述他们演化的特点。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到：有人在海南儋州做盗号木马，有人在广东电白专门打假冒谁谁谁的电话，有人在福建安溪假冒公检法，有人在广西宾阳以QQ社工为主骗海外留学生，甚至连这些团伙的话术文本模式和特点我们都已掌握。”

李旭阳向记者透露，目前基于8亿用户举报及联盟成员单位的数据共享，其中包括诈骗电话、银行账号、木马病毒、钓鱼网址等典型诈骗数据样本，腾讯技术团队以这些大数据作为基础，开发出一个能够自主完成“学习、分析、发送预警信令”的“反诈骗大数据引擎”，通过这个引擎，2015年将深圳地区公检法类诈骗降低了70%，铲掉“10086积分兑换诈骗”“相册木马”等数个信息诈骗团伙。“对于诈骗电话号码，我们不但接受用户举报，也利用机器学习，比如我们判断出主叫和被叫的位置，通话的时间和时长，甚至它和之前标记的骚扰电话是不是一个段等，再给它一个标签，当用户再接到这个电话时，就会被事先提醒，防患于未然。”

邵付东介绍，未来网络安全技术演进的方向，是从“大数据”到“深数据”。“如果你是学生，又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海外，对安全软件来说，就可以调高对你遭遇留学生在线视频诈骗的警惕程度。比如关注有没有新人加你，新人和你聊天多不多，有没有共同好友，甚至和你聊天的这个人有没有异常行为，有没有搞过可疑支付等等。这些就是数据联动。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判断出用户可能遭遇的诈骗场景，并且为他们提供场景安全。对诈骗分子也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预先找到这个人，并且判断出他大概会做什么。”

“打击信息诈骗统一战线不存在旁观者。”丁珂说。而邵付东的说法更加直白：“搞网络安全就是要有个傻劲儿，和诈骗分子的对抗是一场基于技术的持久战。”

无锡冷冻胚胎案、南方证券公司破产案、“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中威”执行案、康菲溢油案、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辽宁特莱维公司与上海欧宝公司虚假诉讼案……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依法公正审理，我国民商事审判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当时，中国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和两名书记员登上外国船只，宣读执行裁定文书后，现场直接将这艘船舶实施了扣押。”最高法院民四庭庭长张勇健近日对记者说，通过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深入实施，公正高效审理每一起案件，中国法院积极参与国际条约和规则谈判制定，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标准。

张勇健所说的案件正是轰动中外的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商船三井”)定期租船合同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威轮船公司(以下简称中威公司)由陈顺通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设立，1940年前后歇业。“顺丰”轮、“新太平”轮(以下简称“两轮”)的所有权人为陈顺通。两轮由中威公司经营，船籍港均为上海。该公司并无其他出资人。

1936年6月16日和10月14日，陈顺通代表中威公司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商船三井的前身)分别在上海签订两轮的定期租船合同，租期均为12个日历月。合同约定了租金支付方式、还船地点等。合同签订后，两轮在上海港分别交付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使用。1937年8月，两轮在日本大阪和八幡被日本军方扣留，后日本递信省以定期租船契约的形式将两轮委托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1938年和1944年，两轮分别触礁沉没和被击沉。

陈顺通于1949年8月8日立下遗嘱，将两轮的权益及应收未收之租金应全部归其子陈治群继承。1987年12月31日，陈治群立下遗嘱，由其子陈震、陈春全权代理向日诉讼。中威公司、陈震、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商船三井，主张两轮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等巨额损失。

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作出判决：对中威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商船三井向陈震、陈春支付并赔偿两轮的租金、营运损失、船舶损失及孳息。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0年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各方当事人的上诉。此后，商船三井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

由于商船三井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上海海事法院于2014年4月19日依法对到达我国浙江省舟山市嵊泗马迹山港的商船三井所有的226434吨“BAosteel EMOTION”轮实施了扣押。商船三井于2014年4月23日根据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全面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包括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营运损失及孳息、船舶损失及孳息，共计2916477260.80元；支付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22575.41元，申请执行费人民币298356元，共计人民币2420931.41元；同时就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其他费用提供了充分可靠并可供执行的担保。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裁定，同时发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解除对“BAosteel EMOTION”轮的扣押。

这是一起普通商事合同及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生效判决最终通过法院扣押船舶的强制措施得以执行。在商船三井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情形下，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船舶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本案通过扣押船舶，促使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履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为历时26年的‘中威案’画上了圆满句号，极大维护了我国法律与司法的权威，树立了我国良好的法治形象。”张勇健说。

文/于中谷

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破局前行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日前，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因县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向庆云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后，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方案》，这是检察机关试点公益诉讼的“操作手册”。

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501件

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在审查某公司污水处理厂涉嫌污染环境罪案件时，发现该公司在未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情况下长期违法生产，排放大量污水造成环境污染。经查，庆云县环保部门虽对该公司多次作出行政处罚，但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根据规定向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后，庆云县环保部门仍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职责。2015年12月16日，庆云县检察院在严格落实诉前程序后，依法对庆云县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向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结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收集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试点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据了解，检察机关一方面从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反映强烈的方面入手发现适宜提起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从对重点案件线索及时批转督办中发现线索。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501件。

启动诉前程序及时督促履职

目前，最高检发布15起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诉前程序典型案例。记者发现，这批案例中有7个地方环保局和3个地方国土局因怠于履职被通报。

其中，江苏省宜兴市检察院在办理潘国良等人污染环境罪一案过程中，发现江苏联聚材料有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在未向常熟市环保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转移危险废物亦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转移危险废物并交由无任何化工废料处置能力的个人处置。常熟市环保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存在履行职责不力的情形。

2015年8月31日，宜兴市检察院向常熟市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依法依规对江苏联聚材料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排查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加强对相关企业危废监管等。

一个多月后，常熟市环保局对涉案公司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20万元。

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经程序。设立诉前程序的目的就是为提高检察监督的效力，发挥行政监督履行职责的能动性，节约司法资源。

郑新俭介绍，在环境保护领域相关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案件中，行政检察机关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其纠正表现为：对污染及时进行处置防止损害扩大，对污染企业或个人给予行政处罚，对污染企业进行跟踪监管并督促落实环保措施，对相关案件线索依据相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等等。

在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行政案件居首。截至2015年12月底，试点地区已经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办理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245件，其中民事33件、行政212件。

“试点以来，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体现出回复更及时、采纳率更高、实际效果更好的新变化。”郑新俭表示，这些变化与行政机关因面临被检察机关起诉而主动纠错或履责有关，体现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优越性。

试点为修订法律提供参考

据了解，目前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已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5件，人民法院均已立案，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此外，湖北、吉林、安徽等地检察机关还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适用法律相关问题与省高院会签规范性文件。

“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相当于刑事公诉，法院应当受理，不能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效力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

对此，最高检新发布的《实施办法》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试点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郑新俭表示，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益诉讼没有形成的经验，二是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其中有请求赔偿损失，这个损失的评估鉴定费用谁来承担、怎么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

另外，根据《实施办法》，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拟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应当报最高检审查批准。这是否意味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门槛提高了？对此，郑新俭表示，检察机关对所提起的公益诉讼履行审批程序，是试点阶段为了规范行使检察权，保证试点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并不会提高公益诉讼的门槛。“我们会根据试点情况进行总结，然后再来确定如何调整。”

中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喻文光指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成功实施和健康发展，除了自身制度和规则的建立与完善以外，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的保障，例如行政程序、复议、诉讼保全等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涉及民诉法、行诉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试点工作正是积累经验，为修订法律提供参考。”郑新俭表示，试点结束后，对经实践检验的、切实可行的经验做法，最高检将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春节期间，驻守在粤港边防一线的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专门组织官兵对所有基层单位进行安全大检查，整改执勤隐患23处，筑牢安全基石。图为支队官兵正在检查网络安全使用情况。

李建帆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虎

维护
法律
树立
侵权被